

·中国典籍在海外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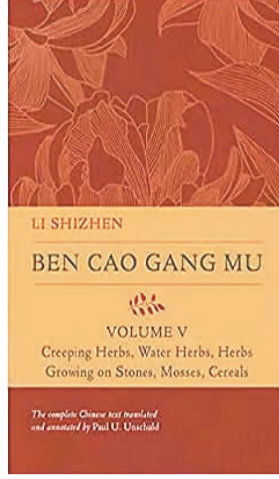
《本草纲目》

护佑人类的独特知识体系

何明星 赵薇



1975年春阳堂出版的《本草纲目》复刻版



文树德的《本草纲目》英文全译本，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

限定语种非中文，检索出3691条信息，其中外文书籍文献为701条，图书资料2958条，在线出版物667条，影像资料44条。

《本草纲目》在亚洲

《本草纲目》在亚洲的传播，一是由周边国家来华的官员、使者和医学专业人士、留学生作为传播主体，并对相关国家、地区的医药炮制等医事产生重大影响；另一个是中国大陆的移民群体，将《本草纲目》作为生活常备书带到相关国家和地区，可谓民间渠道，影响更为广泛。

1607年，曾大量出版汉籍的日本京都人林罗山在长崎获得《本草纲目》金陵本后，献给了江户时期第一个幕府德川家康。德川家康非常珍视，将其置于幕府座右备查，被奉为“神君御前本”。

此后，日本出版了多个《本草纲目》的注解与研究专著，如1608年，日本名医曲直濂玄撰写了《药性能毒》，1612年林罗山撰写的《多识篇》。第一部翻刻版本是1637年野田弥次右卫门刊本，在中文旁加注日文假名与标点。据统计，19世纪70年代前，日本研究《本草纲目》的专著达30多种，甚至还形成了两个专门研究本草的学派——京都学派与江户学派。

1929至1934年，日本东京春阳堂陆续出版了15册《头注国译本草纲目》精装铅字本，被称为“春阳堂本”。它将原书全文译为现代日语，并附校注及索引，是第一部完善的《本草纲目》日文译本。据笔者检索，日本有关《本草纲目》的图书超过210种，影响较大的分别是《本草纲目启蒙》《普救类方》《广益本草大成》《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》《国译本草纲目：52卷，拾遗10卷》等。

据记载，1712年，朝鲜使者将《本草纲目》带回到朝鲜，由于篇幅过大，因而没出刻本，只以抄本形式流传。朝鲜学者、医者纷纷对《本草纲目》进行注解与研究，撰述了许多新的医药图书，如1799年康命吉撰写的《济众新编》，它与《乡药集成方》《东医宝鉴》并称朝鲜三大医书，大量征引了《本草纲目》的内容；洪得周根据《本草纲目》附方编成《一贯纲目》。进入20世纪后，韩国出现了多个《本草纲目》的韩语译本。

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草药，就有《本草纲目》，遍布全世界的唐人街中的中药店可以证明这一点。今天，在泰国曼谷、菲律宾马尼拉、新加坡的大型购物中心、超市里，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中草药。中医药在数千年的潜移默化中，被东亚、东南亚、南亚等其他民族所认知、接受和使用，成为护佑人类生命健康的必需品。

《本草纲目》在欧美

不同于在亚洲的传播，《本草纲目》在欧美世界的传播主体是来华传教士。1650年，

波兰天主教来华传教士卜弥格以图文形式，用拉丁文撰写了一本《中国植物志》，其中相当部分内容依据《本草纲目》。该书于1656年在维也纳刊行，开创了欧洲人研究、翻译《本草纲目》的先河。2013年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张振辉研究员将其译为中文。

1735年，法国巴黎耶稣会教士、汉学家杜赫德编辑整理27位在华传教士的通信、著作及研究报告，撰写了《中华帝国全志》，其中第三卷摘译了《本草纲目》部分内容，介绍了60类本草以及数十种药品，这是第一个《本草纲目》法文节译本，出版后轰动欧洲。《中华帝国全志》多次再版，后被译为德文和俄文。

根据李约瑟考证，此前，法国医生范德蒙德1732年在澳门行医时获得《本草纲目》，对照书中的药物记载采集80种矿物标本，编为《本草纲目中水火土石金石诸部药物》，但直到1896年才通过德里的著作《中华金石》得以全部发表。

20世纪后，《本草纲目》陆续出现多个德语、英语节译本。1920年，美国学者米尔斯在朝鲜教学期间，将《本草纲目》译成稿本40余册。

在此基础上，在中国从事临床研究的英国学者伊博恩，与中国学者刘汝强、李玉田及朝鲜学者朴柱乘合作，1941年完成了《本草纲目》的草部、谷部、果部、木部、兽部、人部、禽部、鳞部、介部、虫部、金石部内容的英译，虽不是全译本，但较忠实地反映了原书精髓和特点，为西方读者阅读《本草纲目》提供了更多的便利，1977年由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, Inc.出版社出版，此后不断再版。

目前在英语世界影响较大的是德国医史研究专家、汉学家文树德历时多年翻译的《本草纲目》英文版九卷本，该书附有大量注释，考证严谨，是《本草纲目》第一个英文全译本，2020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《本草纲目》改进了传统的分类方式，格式统一，叙述也较为科学和严密，不仅是一部药理学著作，还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，在科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。时至今日，它依旧提醒着21世纪的人类社会，要从自然界寻找强身健体、抵御疾病的方法与途径。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的发明，就是中华文化与知识体系在今天依旧发挥巨大作用的典型例证。2020年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莲花清瘟胶囊（颗粒）被中国药监局批准用于轻型、普通型新冠肺炎的治疗，让全世界民众进一步认识到了中草药的价值。

《本草纲目》及其中医药学，作为独特的中华文化知识体系，不仅护佑国人对抗疾病、瘟疫的侵袭，还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思想与精神。

（何明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、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主任，赵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）

说家吴敬梓化身《儒林外史》中的杜少卿，冷眼旁观真假名士、真雅俗雅，都在对历史人物生活空间与生存场景的叙述中，让某种精神力量与光辉跃然纸上。也因此，《旧时燕》似乎设置了一明一暗的双线主题：表面看来，程章灿着力描绘的是烟雨楼台、高阁临江、半山园的秋日、掘河埋金的帝王；往深里说，程章灿想要追寻的是从古至今绵延不绝、隐约不可名状的金陵之“气”。在书写“金陵王气”的过程中，他没有使用怀古文化散文中常见的悲凉、失落、虚无的腔调与姿态，而是放松自在，用最细腻的情感，去写历史深处的角落与细节。“城市越古老，‘气’象越峥嵘”，古都南京的峥嵘之气，既是城市独特的文化生态，也是《旧时燕》想要寻求的精神内核。

2019年10月31日，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。这座千年名城固然有灵魂，但终究不是人类，不会自陈心事。她的文学气质，不仅有庙堂之上高处不胜寒的书写，更应该有来自日常生活的、活泼泼的判断与叙事。程章灿所期望的，是“让城市来叙述文学与历史，代替常见的英雄主角；同时反过来，也让文学和日常生活叙事来叙述一个城市，代替那些枯燥的数字统计”。城市传奇的精髓，所托或许正是复杂不可辨的峥嵘之“气”，与之类似的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“道”，它的意义不在于完成，而是永远在路上。

□ 金少帅

只是传奇故事的发生场所，而更多地承载了作者的精神倾向——那种超越世俗精致生活的自然界的壮丽与优美。城市的美与开阔，被赋予了独立的诗意。

城市传奇不仅是空间的论题，也是时间的论题。对程章灿而言，用“小历史”的笔法，于细节处还原历史长河中此地此景发生过的一切，是城市叙事的切口，也展现了其谦和节制的叙述风格。他不徐不疾的节奏，既能把读者吸引进历史故事，又能在严肃客观史料的同时，铺陈一小段幽默的评论。在《“莫愁”变脸》中，程章灿历数了关于莫愁真假假假的传说，消弭了历史真实与虚构细节的对立，他不苛责热衷传播故事的“好事者”，只是用轻描淡写的语调评说“这样的考据恐怕不免有些多事，甚至有些煞风景”，更兼论莫愁故事的蓝本是东晋谢安别墅，传说之辞也应属“南京‘土产’”，寥寥闲笔，亦庄亦谐，清俊灵巧。

《旧时燕》的贡献在于用历史的形式，用城市古迹的考证与探寻，来完成作者心中城市性情的潜意识表达。无论是《贵妃之死》中发生在5世纪建康城内刘宋孝武帝与贵妃之间轰轰烈烈的爱情，还是《名士风流》里小

华夏地理学的兴起

□ 周公度

我有一个观点：中国人的天下意识，源自《周易》，一源出《山海经》。

《周易》洞悉万物本原，推崇变化；《山海经》的叙述以山为中心，所谓“又西一百四十里”“又东一百五十里”，虽有千山万水，却有仿佛坦途一样的畅达，深具少年之气。在“海外四经”记叙中，开篇的“六合之间，四海之内”思想，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天下意识。

我们看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，很少有人说路途之苦、时光之缓，而是一份从容与豁达，背后即是对人世变化的理性认知，和由天下意识所寄寓的山水涵养出的内心格局。

王敖的学术著作《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：地理学、制图学与文学》（长江文艺出版社），在此向上别出心裁，是近年来学界能予人启发的创见之作。

他认为“在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后，致力于恢复帝国秩序的期间”，“人们高涨的地理空间意识”，首先反映在地图与地理学的变化上，如朝廷资助撰写的贾耽《海内华夷图》及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。二位均曾官至宰辅，在政治家身份之外，也是重要的地理学家。王敖并未言及贾耽的《海内华夷图》与《山海经》的关系，但对“华夷”二字的辨析，却印证了其源流。

其次体现于源源不断创作出的文学与地理两个领域的交互文本。文学与地理的交互，属于被动的文本，究其本质，是职场变化导致的个人行迹区域的变迁。书中举了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元稹、白居易等人文采斐然的作品，诗与游记，璀璨可观。他们的仕宦

行历，需要时时借助于前者的帝国疆域“地图”，但对他们而言，地图不仅仅是疆域，更是心灵史。

王敖并未局限于文学意义上的论证，还有一个观点颇为珍贵。贾耽的地图，采用了地理与天文连接，“将地上的地理风貌与天上的星辰相对应”“将行政区划与二十八宿相对应”。这段论述呼应了先秦的宇宙观，结论又回到了现实的政治，“通过天象与地理的对应，中华疆域形成了几乎永久性的固定系统”。

相应的记载脉络在《史记》之后的中国历代史书之天文志中，也有侧证。诸如太史丞李淳风的天文学厘定、一行法师的天文测量。一行法师的天文测量，北至铁勒回鹘，南至日南林邑，在宇宙星宿中，发现人类的位置。

王敖对中唐主题的选择，颇见匠心。此时的唐朝，历经战乱，帝国秩序等待重新梳理，未来的版图遥未可知。但《周易·系辞传》所谓“生生之谓易”，官宦文人的作品中仍普遍体现出一种“焕发”与“勃发”之气。在当时，中华疆域“固定系统”的概念已然根深叶茂，这个结论可以解释中国文化中的众多问题。

在《山海经》诸卷，这些早已有了清晰轮廓。如果说《尚书·禹贡》勘定了九州，那么“海内经”提供了一种母体上的可能，文化上的心理学上的趋同性。这也是另一本珍贵的先秦记游之书《穆天子传》的非凡价值所在：天山南北并非遥远的天际；万川归海，而华夏两河均出自昆仑。所以，历朝疆域无论如何变迁，昆仑山始终是华夏文明的源溯，一种无形又茁壮的文明更生之力。



读书人

2022年3月14日，福建厦门五一广场，等待核酸检测的队伍中，一名男子在专注看书。

李立仁摄

我与书的缘分

□ 余春明

我与书的缘分，始于父亲。刚懂事时，常听他给大家讲故事。尤其是在除夕晚上，吃完年夜饭，一家子围在火塘边守岁，父亲一定会讲那些神奇的故事，让大家睡意全无，更让我兴奋不已。我曾稚气地向父亲问怎么会这么多的故事，他笑着说，看书呀，是书写的。的确，父亲休息时总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在读。于是，在我幼小的我心里，书变得重要起来。

那时公社供销社有一个图书专柜，出售根据革命英雄故事改编的小人书（连环画）。只要新书上市，我一定会想办法买下。有时去邻县苏山公社玩，也会去供销社“搜书”。好在价格便宜，一本只要几分钱。几年下来，积累了二三十本。我很珍惜它们，直到工作成家，还收藏在楼上的小书橱里。后来，弟弟把它们送给了玩伴，我还狠狠地骂了他一顿，心里懊恼不已。

有件事记忆犹新。初二一次课间操，教数学的曾丽英老师在后面轻轻喊我，让我解散后去她办公室。她给了我一部长篇小说。我大喜，奉为至宝，连声道谢，一个晚上就读完了。后来她有什么新书，总会让我一睹为快。可以说，曾老师是我文学路上的引路人。别同学从家里拿来的小说，我也会想办法借看。中学4年，我读了《青春之歌》《红岩》《林海雪原》等名著，对世界观、人生观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中学毕业我回乡务农，算是回乡知青。大队里同时回乡的有5名同学，他们家庭出身好，有的分到公社电影放映队，有的任大队出纳，有的驾驶拖拉机，都是吃香的行业，我被分配到他们不看好的大队小学当老师。

说老实话，我倒非常满意，因为又能同书打交道了。除了教科书，我还如

饥渴地阅读学校订的《人民日报》《江西日报》的文艺副刊，这些活页“书籍”弥补了当时图书的匮乏。光读不过瘾，我就抄在专门订好的白纸上，冠名为《20世纪诗选》。有目录，有后记，像模像样，保留到现在还有十几本。

那时候，公社辅导区几乎每周组织一次教师集中学习，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同行借到了《唐诗一百首注释》《宋词一百首注释》，特别高兴，全本都抄了下来。这一时期，我还抄了《西厢记》《牛郎织女》等剧本以及《第二次握手》《海寇》等中外小说，连同上面说的诗选，手抄本叠起来有一尺多高。

改革开放后，新华书店书架摆上了我梦寐以求的文学名著。这时我调进了县城中学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那时书也不贵，一般几毛钱，贵点的也就一两块钱，买了四大名著后，还能考虑其他书籍。记得一次在书店里发现了岳麓社出版的《三国志》，赶快买了下来。回家一看封面，是古典名著普及系列一连串的书名，说明可以邮购。三五年下来，我省吃俭用，邮购了20多本，包括《老子庄子列子》《墨子》《淮南子》《李太白全集》《二拍》《三言》《资治通鉴》《汉书》等，而且大部分是精装，摆在书架上非常醒目。归有光在《项脊轩志》中说他“借书满架，我可自己买的”。

最近这十几年来，书价一涨再涨，买不起了。我就常跑书店，倚着书架翻翻书，过过瘾。

由于爱写点东西，近十年来也陆续出了八九本书，虽然难登大雅之堂，却也偶有畅销，为“下里巴人”喜欢。我与书的缘分又进了一层。有时我想，如果说我一生还算有点成就，恐怕最该感谢的是书。